

## 懷念「南港學派」 傳人李國祁教授

陳三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### 一

去年（2016）6月初，我和內人剛從北歐旅遊歸來，有一天到研究室打開電腦，第一個看到的是永迪（李國祁教授長公子）傳給我的 e-mail，才知國祁兄已經不幸仙去了，立刻致電李大嫂執明教授表達我誠摯的慰問和內心的不捨，也知道一些後續的情形，因為我並沒趕上在師大召開的治喪會。

國祁兄的逝世，不僅是他的夫人痛失一位好丈夫，他的下一代失去一位好爸爸、好爺爺，也是我們大家痛失一位好朋友、好同事、好教授，更是臺灣史學界痛失一位一流的史學家。我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在大家的心目中，國祁兄當然是史學界一號人物，是一流的史學家；就他自己的認定和自我期許來說，他也絕對不會自居於二流史學家的地位。因為我知道，某次，香港有個私立大學，徵求他願否到該校講學一年？他若無其事的說：「在臺灣我多少還是個一流的史學家，若去了該校，豈不變成三流的史學家！」說得也是。要邀請的至少也是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吧！

### 二

剛從德國學成歸來時，國祁兄可真是意氣風發，像所有早期歸國的留學生一樣，他有滿腔的熱誠和遠大的抱負，他想為臺灣這塊土地的學術和教育奉獻點力量。他開眼看

過世界，對曾經服務過的近史所有很高的期望，「愛之深，責之切」，大有一種「恨鐵不成鋼」的心理，至少希望看到近史所成為臺灣近代史研究的一個中心、一個重鎮；他對自己出身的臺師大也很關心，也有很高的期望和想法，希望師大能夠培養出眼界開闊，有大氣魄的人物，而不僅僅是中學老師而已（這話並沒有職業輕視的意思）。事實上，師大倒過來寫便是大師，希望師大能培養出更多的大師來。

### 三

大家承認：國祁兄才華橫溢，口才好、文筆好，是難得的人才。我們都喜歡聽他在討論會上鏗鏘有力的發言，也樂意拜讀他所寫的、深富啟發性的專書和論文。有才氣，引起別人羨慕，頂多嫉妒，對自己無傷；有才氣之人，往往自恃甚高，傲氣也跟著來，脾氣也伴隨而生。有才氣，若說沒有些許傲氣或脾氣，實在太難太難！在不知不覺中，發了脾氣之後，受之者當然不舒服，這是傷人亦自傷！國祁兄留學德國，據我觀察，他具有日耳曼人勇敢的開拓精神，亦繼承德國人實事求是的作風，在表現於外時，可能容易予人一種霸氣的流露而不自知。「三公」（所內3位資深研究員）在本所欺上壓下，氣焰之盛，大家敢怒不敢言。國祁兄挺身而出，對他們並不假辭色，多次公然在所務會議上指責他們幾年不寫一篇文章，沒有成

績，如何做同仁的表率，那種義正詞嚴、咄咄逼人的氣勢，看在「三公」眼裡，聽在三公耳裡，已到了咬牙切齒的地步，真是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？「三公」之一的大師兄，曾私下向我抱怨，說國祁兄若是一條龍，也不能到處亂咬人！

### 四

國祁兄是個具有開拓性、創新性的幹才人物，但回國之初先到近史所服務，依我看卻有擺錯位置、水土不服、龍困淺灘，不能發揮所長的問題，何以見得？

第一，那是一個所謂「威權的時代」，但那時的郭廷以老師表面上沒說，可大家都知道，要交棒給國祁兄（徒增阻力，見光必死）。事實上，郭先生的權威、光環不再，能量、工具不足，對內擺不平「三公」的杯葛。於是「三公」先是打壓國祁兄的升等，其次，抵制國祁兄借調師大，並處處予以杯葛。凡國祁兄領銜做的事都受到抵制，也即團結聯合對付郭師的一切佈局。最後逼得國祁兄只得放棄南港，辭掉專任，改為兼任，轉換跑道，到師大開枝散葉，開疆闢土。

按理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在南港是龍困淺灘，到師大應該可以龍騰四海，但師大除了有朱雲影老師（另一個伯樂）賞識他之外，也並非一帆風順。在「三公」的散播造謠下，國祁兄被視為「危險人物」，仍有不少同事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他，與他保持距

離。所以，對國祁兄來說，這是一段歷經憂患滄桑，飽受委屈的歲月。

第二，郭師還有一個重大而甩不掉的包袱：福特基金。

大家知道，1950、60年代，公務人員的薪水很低，一般的生活都不是很寬裕。近史所有幸而有福特基金的挹注，可以有點活水，才使得近史所走過憂患的歲月，守得雲開見月明，站穩了腳步，逐漸創出了「南港學派」的招牌。近史所成立於1955年，最初幾乎是慘淡經營。從1962年到1971年，兩個5年計畫，共獲補助42萬1千美元，換算不過1千7百萬新臺幣，其用途為：

- (一)研究補助——按等級發放，比薪資還多。
- (二)圖書購置。
- (三)口述歷史。
- (四)檔案編纂。
- (五)專刊出版。
- (六)人員出國進修。

其中以(一)、(六)兩項問題最多，稍微說明如下：

機關有個小水庫，方便是方便，但像富貴人家留錢給子孫一樣，容易招禍，引起紛爭。俗話說：「財多，人孤獨。」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是也。

若干客卿研究員，或資深研究員、一些懶散的研究同仁，拿了研究津貼不交報告，害得郭老師無法向福特基金會交差，一催就傷感情、撕破臉，行政人員也跟著喝湯分一

杯羹，大家計較不停，永遠擺不平。出國人員也爭先恐後，紛爭不斷，成為大包袱，搞得郭師焦頭爛額，長年不開心。所以郭師曾說：「成也福特，敗也福特」，頗有悔不當初的感慨。就像馬雲自己也說：「我一生最大的錯誤，便是創立阿里巴巴」。

第三，「三公」的杯葛。「三公」為何要杯葛國祁兄？理由很簡單：

- (一)他們處在一個老一代長期霸占不放，又面臨年輕人已成長，構成威脅的「夾心餅」時代，不得不起而捍衛自己的利益；
- (二)同時，他們也要為自己爭一口氣，他們不甘被羞辱；
- (三)他們不在乎眼界或寬或高的問題，也不關心近史所的發展，能不能成為近代史研究中心的問題。在兩代壓縮下，在夾縫中，他們在乎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，只關心要反擊。他們抗擊老一代的權威比較難，自然以為壓制年輕人比較容易，甚至由此連帶排斥擁有海外高學位的歸客；他們喜歡用低階、對他們沒有威脅的人。

第四，年輕者不成氣候。國祁兄始終扮演衝鋒陷陣，進行不公不義改革的領頭羊，扮演大將角色，包括反對「三公」之一接任近史所所長，有18位同仁簽名連署，錢思亮院長為此大傷腦筋。可惜他上面沒有奧援（院方並不鼓勵），左右也沒有聯軍（各所並沒有集氣相應），下面也只是些尚不成

氣候的年輕追隨者，所以這一連串被比喻為「紅衛兵造反事件」或「二十八星宿大鬧天庭事件」的故事，其下場可想而知，只不過國祁兄首當其衝，做了烈士，當了犧牲品。

## 五

國祁兄對3位資深而追隨不上時代要求的研究員不假辭色，卻對年輕的學弟愛護有加。過去本所每一本專刊，幾乎都是郭老師耗時費神、一字一句、嘔心瀝血、一改再改，改出來的結果（郭老師這時已沒精力這樣做）。回國之初，國祁兄發現一位年輕學弟費力所完成的專刊，卻是結構鬆散無組織，層次不分明；他以為現在補救還來得及，否則將來如何走出「南港學派」的師門？於是他以身作則，邀了幾位文筆較好的同仁，拆開專刊，每人負責一章，進行大改造，眾力成城，此一專刊後來終於達到出版的標準。

國祁兄對我也愛護有加，我刊登在集刊上的一篇文章，〈略論馬建忠的外交思想〉，也是經過他的過目、修改、潤飾，才得以通過刊登的。

國祁兄也鼓勵我到師大兼課，說最好系裡一門、研究所一門，以文化史或社會史為宜。我自知沒有這麼大的本事，所以從頭到尾只開了一門「法國史」。

國祁兄樂於助人，具有打抱不平的俠義之風。他比我先回國，在自己宿舍安頓好之後，知道我還在流浪為宿舍問題而奮鬥之

際，他比別人表示得更加關心。等到我爭取到一棟宿舍卻沒有家具，而另一位臺大與中研院合聘，因新婚而搬進宿舍與我做鄰居的驕客，院方卻大方的補助了一筆為數不少的家具費，國祁兄聞訊為我大抱不平，嗆聲說，如果所方不便出面，他願意發起同仁簽名抗議，為我爭取。此外，他還陪我去見總幹事（今改為祕書長），攪得滿院風雲，最後院方為了息事寧人，答應補助部分了事，並表示補助鄰居的數額，將由住者自行吸收。國祁兄的見義勇為，為我出頭打抱不平，得罪了一票學術界主流派和當權派，對他以後參選院士是否有不利的影響，我無法確定，但是我始終為此感到內疚難安。

國祁兄夫婦都喜歡打橋牌，娛樂消遣一番。早期，他們住研究院路2段4弄時，我是他家常客，朋園兄家就在他家對面，四缺一時，我也常常接受徵召。近史所也成立一個橋牌隊，成員除國祁兄、朋園兄外，包括呂實強、張存武、王樹槐、李念萱等幾位大將，我是跑腿兼聯絡人。不過當時只參加本院所際比賽，或偶爾與臺大、外交部等單位做友誼賽而已。

回憶起過去那一段風風雨雨的日子，我要說的是，我與國祁兄同過事，一度並肩打過仗，不管美好或不美好，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是非曲直都已放下、放開。

最後，我要說，國祁兄，我們會永遠懷念您，請您安息吧！

（2017.02.20）